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起点

——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段志平,马俊峰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霍布斯与洛克以抽象的人性为出发点,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契约”的基础上建立市民社会理论;黑格尔虽然认识到“特殊的人”,但其市民社会始终被吞噬在绝对精神的自我进展中。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入手,揭示出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分裂与矛盾,从而使市民社会获得了人的“感性的活动”之历史起点。

[关键词]市民社会 “感性的活动”;历史起点

[作者简介]段志平(1976—),女,山西省大同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博士生,中北大学法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法学研究。

马俊峰(1954—),男,山西省稷山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4-0164-04 [收稿日期]2012-04-20

在哲学领域中论及市民社会理论,其历史性的基底存在于何处?近代哲学要么将之归结为自然状态下的“契约”,要么赋予其“理性精神”,殊不知,它们共同的渊藪是近代理性形而上学。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的生产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入手,分析市民社会的分裂和矛盾,在资本和形而上学两个向度上展开批判,从而将人的“感性的活动”作为市民社会的历史性之基开辟出来。

一、近代市民社会的理性形而上学根据

自笛卡儿开出思维内在性的哲学原则以来,哲学在近代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形而上学根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共同分享着这一根基,都将内在的、独立的思维作为一切分析由以始发的依据,从而建构起近代理性形而上学诸形态。由于扎根在近代哲学的思维内在性原则之中,这种市民社会理论将理性形而上学的生存论意蕴外显出来。

在思维由自身出发的思维内在性原则的影响下,霍布斯将哲学定义为“根据任何事物的发生方式推论其性质,或是根据其性质推论其某种可能的发生方式而获得的知识。”^{[1] P537-538}如同黑格尔所评述的那样,霍布斯将权威回溯到内在于我们自身的原则,凡事都

需要经理智论证。循着这种认识论进路,霍布斯首先将人的利己性设定为逻辑前提,又将该前提植入平等而自由的自然状态之中,以此观照人性利己与自由、平等之间的矛盾,即人们在保全自身的同时又具有伤害他人的潜在危险。一旦欲望的无限与理性的规定之间无法达成和解,自然状态就沦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伟大的“利维坦”则为结束这种混乱状态而诞生。“利维坦”以超越缔约各方的姿态保障全体成员的安全,以维系社会秩序为目的,推动自然状态向政治状态过渡。

同样,洛克从认识论的起源出发,提出并论证了作为人自身产物的理性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智知识。人具有由心灵活动的简单观念来获得知识的主体能动性,因而在自然状态下,人们致力于保护自身与生俱来的平等和自由,尤其是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财产。自然状态虽具有完备性,却缺乏一个共同的权威来保护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订立契约并授权第三方行使法律裁决的权力,自然状态由此进入政治社会,即“人人放弃其自然法的执行权而把它交给公众,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才有一个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2] P54}。从抽象的人的权利出发,将财产神圣化的原因归结为劳动的中介,是洛克比霍布斯的高明

之处 这也为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中的“特殊的人”作了铺垫。

然而 洛克的这种经验主义做法却还是被黑格尔批评为“不把经验看成全体中的一个环节,而是把它看成真理本质了”^{[3] P137}。理性形而上学在黑格尔这里达到了顶峰,市民社会理论作为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毫无疑问地分有这一生存论根基,这从其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出场路径便可略见一斑。黑格尔法哲学作为关于客观精神的哲学,包含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环节,市民社会是伦理自我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是一种体现了特定意志自由的伦理实体。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自由理念的实现在伦理阶段又依次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阶段。家庭是因“爱”的规定性而将其成员连接起来的社会共同体,其生命是有时间性的。一旦家庭的伦理解体,就是市民社会开启之处。市民社会作为差别性与特殊性的阶段,是诸多个人和家庭的聚集,用“利己”的原则取代家庭阶段“爱”的原则,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爱关系在此时已被利益关系所消解。对市民社会的两大创见是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其一,“特殊的人”本身即是目的。在相互独立的市民社会成员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唯有在与他人的区别中才能成为自己。“个人只有成为定在,成为特定的特殊性,从而把自己完全限制于需要的某一特殊领域,才能达到他的现实性。”^{[4] P216}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作为法律的法。与个人的特殊性相对的是法的普遍性形式,市民社会的成员是相互依赖的,每个人都以他人为手段。因此,在市民社会中,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市民社会为个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得到充分展示提供了舞台,因为各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利益联合都是工具性的、外在的,而不是自然的、内在的,也就是说,作为法律的法只有形式上的普遍性,无法克服市民社会中的矛盾。这种只顾追求自身利益、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意志的过度张扬势必导致伦理精神的丧失、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人类本质的异化,这也决定了市民社会必然会被更高的发展阶段所取代,即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真正统一的“国家”。可见,黑格尔尽管精准地洞见到市民社会中存在“特殊的人”,并将抽象的人拉回到现实的物质与法律关系中,但他对理性精神逻辑发展的迷恋却又使人的现实性隐在幕后,导致他在市民社会的历史起点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发生近视。

至此,我们不免要继续追问,倘若自然法的契约、理性精神不是市民社会历史的起程之处,那么,市民社会的历史起点又该向何处寻求?在黑格尔专注于构建理性形而上学大厦而在这个问题上止步之处,马克思

却将市民社会的历史起点开显出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关系”的哲学境域出发,剖析了异化、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并将“感性的活动”视为市民社会的历史起程之处。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 “感性的活动”的历史性出场

市民社会在马克思各个理论探索时期的含义不尽相同,在《手稿》中主要指称资产阶级社会。不同于霍布斯和洛克从抽象的人性出发,也有别于黑格尔从“自我意识”出发,马克思是从现实生活关系出发来解析市民社会的。这种解析以研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为切入点,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深化到生产关系领域,并最终论证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关系是异化劳动的产品及结果,从而揭示出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和真正本质。在《手稿》中,马克思将异化劳动作为全部论述的出发点,并在对哲学、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研究中以此概念一线贯穿。

马克思首先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人的统治。在他看来,人的自由活动只有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时才成为可能,然而,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却是:具有感性生命的活生生的人异化成为单纯的“劳动人”。对于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和进行的,马克思以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将之揭橥出来。由此可见,他并未预设原始状态,而是直接以现实为前提,在资本统治下直面人的感性存在状态。

通过对资本的批判,马克思在确定“感性的人”这个市民社会的出发点之后,进而从资本的制度性体现层面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而这一维度则通过分析感性的人身上所承载的生产关系——私有制体现出来。私有财产体现着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是异化的社会。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5] P283}从劳动方面来说,完全异己的劳动只是将人视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这种“劳动人”的社会存在即表现为现实的非存在;从资本方面来说,资本从一切自然和社会属性中抽象出来获得统一性,而不管其现实内容如何。换言之,异己的劳动使人由现实的人沦为抽象的劳动人,资本又摇身一变成为君临一切社会生活的抽象统治者。这样,劳动者并不获得劳动产品,劳动的目的只是为抽象的资本服务。私有财产原本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但由于工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劳动与资本处于相分离的状态,生产活

动本身对于工人而言是外在的和敌对的东西 故私有财产又成为异化劳动的原因与手段 这是私有财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同时,马克思批判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处处充满矛盾的社会。私有财产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体现出来,构成市民社会“现实的矛盾”和“本质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深刻基础。因此,要想克服市民社会中的这种矛盾,消除以异化劳动为中介的人的自我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本身,进而扬弃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制度,把人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才是完成人的解放的最重要条件。

诚然,《手稿》一般不视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但马克思在分析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过程中,也通过论述物质生产劳动开始逐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物质生产劳动的剖析使得市民社会理论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为成熟,市民社会被马克思认定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生产劳动是理解私有财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在整个市民社会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生产劳动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这促使马克思由对市民社会的政治和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由上层建筑推进到经济基础,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使得异化过渡到异化劳动成为必然,虽然这一过渡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情怀,却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重大转折。他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5] P298} 在此之前,马克思已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他对市民社会本身的理解还是比较抽象、笼统的,尚未确立科学的生产关系概念,仍交叉使用市民社会、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这三个概念。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马克思意识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归根结底是由生产、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进一步提高到物质生产决定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高度,是马克思首次对整个社会生活及其内部基本关系所作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概括。对此,广松涉也曾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新地平”,其核心范式就是作为人类生存实践基础的物质生产。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感性的活动”这一历史起点,与传统的知识论阐释路向根本不同,借用海德格尔的话即“不在于用推导的方式进行论证,而在于用展示方式显露根据”。这昭示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历史起

点不是要指出“是什么”,而是着力探索“如何是”。埃蒂安·巴利巴尔也指证这种历史生存论“可能没有描述事物的存在状态,更少描述机构的系统,而是较多地描述一个过程”^{[6] P51}。

三、市民社会“感性的活动” 历史起点的革命意蕴

马克思对人的“感性的活动”这个市民社会历史起点的发现,与他的理论前辈们从抽象原则来规定市民社会的做法大相径庭,这也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之前的市民社会理论为何始终未能摆脱理性形而上学的内核?我们说马克思触碰到了本真的市民社会历史之基,是一相情愿的赞誉之词,还是理论诉求下的实至名归?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之前的市民社会将人的生存状态隐蔽在了先在的哲学原则之中,无论是霍布斯、洛克抑或是黑格尔,其市民社会总是遵循着给定的先在原则,然后根据这个原则规定人的现实存在。而马克思则将人当下的生存状态本身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论证了人的“感性的活动”。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它避免了形而上学的二元劈分,而将思维活动转向事情本身。对于作为市民社会历史根基的人的“感性的活动”而言,马克思通过三层递进关系显示出其重要意义:其一,具有深刻感觉的人的丰富性、全面性编织了社会生产关系,人成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现实。人的感性存在尽管被异化劳动所泯灭,但感性活动却属于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感觉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直接成为理论家”。其二,不是在抽象的人以及抽象的社会原则中,而是在活生生的社会状态中,才能消解诸如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能动和受动等的对立,并由此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的自律性。其三,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实践力量和方式使得解决理论的对立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5] P306} 以上三点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这标示着马克思至今仍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思想家,而并非如汤姆·洛克曼所指认的那样,他始终是一个作为“黑格尔最好的学生”的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后来的“消灭哲学”的意蕴,不仅仅在于批判哲学本身在改造世界方面的缺席,更重要的在于批判哲学据以生存的现实。

在市民社会中,人的“感性的活动”如何才能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改造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就是自然科学及其开启的工业化进程,这使得马克

思也难以逃避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人之所以是一种“感性”的存在,是因为人具有“感性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人之为人,世界之为人的世界,都只能被看作和理解成“感性的活动”的必然结果。就此而言,马克思是在生存论的高度上去理解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的。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就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5] P307}

对象性的活动构成了《手稿》的基本原则,但马克思并未单纯从批判性的层面去看待市民社会,而是隐含着另一研究路径——从肯定性的层面对市民社会中“对象化劳动”的分析,这使其市民社会理论呈现出一种兼具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理论“复调”的整体外观。

马克思在充分肯定市民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性。市民社会并非解体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5] P306}。劳动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产品,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到一个外部对象上,从而实现自我确证。对象化是一切劳动之共性,难以想象那种没有对象化的劳动。在劳动的异化关系中,劳动的对象化意味着劳动者创造出一个独立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力

量,劳动的实现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劳动者与自己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不能占有自己所生产的东西,那么,必定有一个与其相对立的个人对之进行占有。通过这种剥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就昭然若揭了。所以,市民社会中包含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识到在市民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为后来他在“物质生产关系”层面上理解市民社会奠定了基础,并最终使其成为描述历史的重要概念。

这样,马克思在《手稿》中于历史基础上发动的哲学革命,把人的存在认作是一种“感性的活动”,将人的解放视为一种“感性的解放”。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片面性,马克思开启了市民社会“感性的活动”的历史性依据,使思辨的哲学完成了对现实生活的进入,同时也为无产阶级提出了变革生产关系的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 [1] 霍布斯·利维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2] 洛克·政府论(下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3]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6] 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Historical Beginning of the Marxist Civil Society: Reading《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DUAN Zhi - ping , MA Jun - f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872 , China)

Abstract: Hobbes and Locke took the abstract human na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 they constructed civil society theory from the base of “contract” in natural state; Although Hegel recognized the “specific person” , but his civil society has always obscur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absolute spirit interpretation. Marx’ s analysis the alienation , labor and capital in capitalist society , revealed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divisions and conflicts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civil society , so that civil society access to the people’ s “perceptual activity” on the historical beginning.

Key Words: civil society “perceptual activities”; historical beginning

[责任编辑、校对:何石彬]